

本期专栏：中国家庭研究

家庭变迁、家庭政策演进与 中国家庭政策构建

李树茁，王 欢

(西安交通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从中国家庭变迁和中国家庭政策演进两个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为视角，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30多年来家庭政策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提出构建中国家庭政策的建议。中国家庭呈现出核心、主干、联合家庭此消彼长、波动往复的变迁特点，“家本位”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同时中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现出概念范围宽泛、目标指向含蓄、补救型模式的三大主要特征，也表现出“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两者平衡的三阶段演进历程。未来中国家庭政策的构建要围绕中国家庭的两大特点——稳健的“主干家庭”和绵延的“家本位”价值观念，以平衡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为取向，向政策概念范围精准、目标指向明确、系统普惠型模式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中国；家庭变迁；家庭政策；政策演进；政策构建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6-0001-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6.001

Family Changes , Family Policy Evolution and Family Policy Formation for China

LI Shuzhuo , WANG Huan

(The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 Xi'an 710049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of family policy in China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 so as to propos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China's current and future family policy formation. The analyses are conducted in two areas , family change and family policy evolution , with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China and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he Chinese family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the dynamic shift and fluctuation among nuclear , stem and

收稿日期：2016-08-22；修订日期：2016-09-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生计与福利的动态演进及家庭支持政策研究”(71570316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扩展型家庭体系内代际支持机制及老年人健康后果——基于13年的大样本追踪调查”(71273205)。

作者简介：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欢，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joint families , and dominated by a traditional “family-centered” value. In addition , the paper summarized that the current Chinese family policy has evolved three main stages: familialism , de-familialism and a balance between the previous two , presenting a pattern of three major policy characteristics , broadly defined , vaguely directed and targeted , and remedied towards vulnerable familie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future family policy formation for China should be developed with a suitable balance of familialism and de-familialism , and adequate attention of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stem family and continuous family-centered value , so as to form a family policy system which is precisely defined , explicitly directed and targeted , and universally benefited.

Keywords: China; family change; family policy; policy evolution; policy formation

一、研究背景

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在人类历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国家层面看，家庭是最小的生产单位和共同生活单位，维系着生产活动的进行（尤其是在农业社会）以及社会的稳定；从个人层面看，家庭发挥着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精神慰藉等功能，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保障。

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家庭的经济生产能力在弱化，主要由于这一功能更多地被社会化大生产所代替，但家庭的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传统功能依旧在延续。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来说，家庭的精神慰藉功能越来越重要，因而家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然而，以1939年法国颁布《家庭法》为开端，全球促进家庭发展政策体系的建立仅发生在近一百年的时间内，中国则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家庭政策体系。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巨变时期，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动、传统家庭价值观与现代家庭价值观的交织碰撞，使得家庭处于动荡和变化之中。与此同时，中国的家庭政策建设仍处于探索期，还没有形成对家庭行之有效的支持体系。家庭的重要性与家庭政策的不完备之间形成巨大冲突，亟须加强家庭政策建设，从而促进家庭发展及家庭功能的全面发挥。

建立中国家庭政策体系，需要考察中国家庭变迁历史和家庭特点，还需要分析中国家庭政策的演进过程与政策特点。对这两个关键问题认识的不同，则会产生不同的中国家庭政策构建建议。本文将对于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中国家庭政策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两个视角出发进行对比研究，提出对中国家庭政策构建的具体建议。

二、中国家庭变迁：结构与价值观念

家庭是什么？起源自什么时候？变迁过程是什么样的？未来又将往哪里发展？厘清这些问题是进行家庭政策研究的基础，中国家庭的变迁也正是学界在进行家庭政策研究时无法绕开的重要内容。这里对中国家庭的变迁作简要的分析。

1. 中国家庭的结构变迁——“主干家庭”的稳健

通常认为，家庭是由婚姻、血缘、领养关系组成的社会组织。家庭的起源早于国家，是人类最基本的共同生活单位。摩尔根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家族的发展历经了血缘家族、群婚家族、对偶制家族、父权家族（一夫数妻）和单偶家族（一夫一妻）五个阶段^[1]。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后对摩尔根的

理论进行了发展,于19世纪80年代提出马克思主义家庭理论,指出当社会生产力达到极度发达的阶段,生产资料转为公有,私人的家务变成社会的事,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那么如今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专偶制家庭则将失去存在的必要,个体婚姻即以现代性爱为基础的充分自由的、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婚姻将成为主要的家庭模式^[2]。未来家庭将可能和国家、阶级一样消失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下,然而当前家庭仍在不断变迁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全面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形式变迁历程。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带有庞大亲属群体的父系大家庭是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是落后的;而与亲属群体切断联系的孤立的核心家庭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是进步的;家庭变迁的趋势就是从传统落后的大家庭转变为现代进步的核心家庭,家庭规模的大小和家庭结构核心化成为确定家庭现代与否的标准;变迁的原因被认为只和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相关,是技术变迁的结果^[3]。从现实情况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变迁多经过了这一历程,家庭呈现出从不同类型的大家庭趋向核心家庭、规模小型化的一元化、单线演进的模式,核心家庭在经济上是独立于其他亲属而存在的,是一个孤立的家庭生活单位。

这一理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家庭模式曾一度被作为判别全球国家家庭现代与否的标准。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该理论遭到大量批评和质疑,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开始反省和修改,思考因民族、种族、阶级、文化等因素而导致的家庭变迁的不同路径和复杂模式^[4]。对比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家庭结构变迁历经了完全不同的过程,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在解释中国家庭变迁时显得乏力,中国家庭变迁更体现出了修正后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的特点。

杜正胜将中国历史上家庭结构区分为秦汉时的“汉型家庭”、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的“唐型家庭”和唐代以后“汉型”与“唐型”折中的家庭^[5]。综合该研究的发现,“汉型家庭”平均5口人左右,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核心家庭,是秦汉时代主流的家庭结构。核心小家庭的形成归因于商鞅变法,其中提出“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命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这就使得分家成为必然,从而塑造了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社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及至曹魏废除嬴秦以来的法令,主流家庭结构逐渐从核心家庭转为主干家庭,即至少有一个儿子与年老的父母共同居住,发展到了唐朝,就形成了平均10口人左右的“唐型家庭”,这类型家庭的特点是祖孙三代成为一家,共祖的兄弟同居、共财,类似我们所说的联合家庭,至少也有一个儿子的小家庭与父母同居。而安史之乱以后,人口流离,这种大家庭就难以维持了。两宋时期的家庭结构和隋唐又不同,北宋平均每户8口,还存有“唐型家庭”之风,南宋则总平均每户约6口,呈现联合家庭明显减少,核心家庭也不多,主干家庭为主的三者并存的局面。到了清朝,中国的家庭结构则演变为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已婚兄弟同居的联合家庭只占一成,家庭人口数在3到6口左右,即“汉型家庭”和“唐型家庭”的折中。这种家庭结构延续至今。

李根蟠针对这一研究做了修正,认为秦汉时家庭结构虽以核心家庭为主,但仍存在相当数量的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嬴秦法令废除以后,上层阶级逐步以联合家庭为主,但下层阶级由于经济状况等方面原因的制约,仍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因为下层阶级在人数上占大多数。所以到了唐朝时期,联合家庭虽得到了发展,但占据数量优势的是主干和核心家庭。此外,李根蟠指出引起家庭结构变动的原因在于“分家制度”,包括父母在世兄弟即分家的“分异”制度和父母去世后兄弟再分家的“同居”制度^[6]。

及至中国当前的家庭结构,王跃生基于全国六普数据的分析指出,目前中国家庭户的三种基本类型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或称直系家庭)和单人户家庭,约98%的家庭户可归入其中,其中核心

家庭所占比重为 60.89%，主干家庭为 22.99%，单人户家庭为 13.67%。与 2000 年相比，核心家庭所占比重打破了 1982—2000 年 20 年间稳定于 70% 的状态，出现明显下降；单人户比例显著上升，相较于 2000 年增长了约 5 个百分点；而主干家庭则始终保持稳定，并略有增加。此外，核心家庭中的夫妇家庭明显增多，增加了约 10 个百分点。同时，王跃生指出，2010 年 30% 以上的农村家庭有成员外出，城市则为 10%，外出会造成家庭类型的转变，如标准核心家庭和三代主干家庭的破损^[7]。周福林也认为人口流动使大量家庭分解为留守家庭和流动家庭，分解后的家庭为规模小、结构简单的不完整家庭^[8]。

本文认为，中国的家庭形式变迁有以下四个特点。首先，中国的家庭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经历了由扩展大家庭到小型核心家庭的直线变迁，而是有史以来就呈现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并存的局面，并伴随分家制度此消彼长，呈现出波动变迁的态势。其次，在这种动态变动中，在不同的朝代和不同的阶层，虽占主流地位的家庭结构会不同，但主干家庭贯穿始终并存在于各个阶层，保持一定的比例并稳定发展，这正是中国家庭变迁的突出特点，应该引起注意。再次，夫妇核心家庭、单人户家庭、残缺家庭（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等较为脆弱类型的家庭比例显著增加。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短时期、大范围、高速度的城镇化进程带来的人口迁移使得家庭分解为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而这又极易导致夫妇核心家庭、单人户家庭和残缺家庭的增加，即我们常说的“空巢家庭”、“留守儿童”等。最后，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中国特有的家庭模式。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三口之家的独生子女家庭成为近 30 年中国主流之一的家庭模式。

2. 中国家庭价值观念变迁——“家本位”的绵延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根基在于个人，反映在家庭的价值观上，即以“个人本位”为主导，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更为平等和独立。及至当代，按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第二现代性”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正步入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第二现代性社会，其主要的特征——“个体化”，意味着既有社会形式的解体，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范畴等日趋弱化，国家认可的“标准化人生”趋于崩溃，变成了“选择性人生”^[9]。

而中国家庭的价值观念则以“家本位”为主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庭作为古代中国社会关系和国家的基础，夫义妻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君正臣贤，是这个阶段社会理想的人际关系^[10]。近代社会以来，中国家庭的价值观念则经历了 20 世纪初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三个阶段的重大改变^[11]。第一阶段，20 世纪初期，家庭的重大政治性被解构。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经历了反传统热潮，青年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社会进行了决绝式的批判，而封建家长制作为封建统治的基础，首当其冲受到了激烈批判，经过这次冲击，历史上作为政治伦理的原点的中国家庭制度（国家的社会管理单位、赋税徭役、法律、福利等单位），其神圣性、合理性被解构，走向了去政治化的道路。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家庭的重要日常地位被消解。出于建设新中国的集体目标，国家插手通过单位和人民公社、互助组织等替代了家庭的诸多功能，如抚育子女等，家庭不再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对象，因而处于边缘化位置。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家庭的传统核心价值被侵蚀。这一时期，市场化浪潮来临，经济理性以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方式入侵家庭领域，家庭的核心价值理念——关爱与责任遭到侵蚀，并引发了一系列如赡养纠纷、房产纠纷、虐待老人等现象。虽然经历了三次大的冲击，徐安琪的研究指出，家庭失范现象存在，但并不占主流，“家庭衰退论”、“家庭伦理失范论”、“家庭价值功利化”等悲观论者的语言并未得到支持；中国家庭价值观念变迁的总体

趋势是积极、正向和多元化的,如在家庭幸福观方面,幸福观为物欲主义所主宰的揣测未获支持,在代际支持观念方面,未证实青年人孝道衰落,显示出了代际情感共同体的存在以及家庭合作社模式在现代中国的延续^[12]。

三、中国家庭政策: 特点与演进

1. 中国家庭政策特点——概念范围宽泛、目标指向含蓄、补救型模式

从中国现存的家庭政策来看,其在概念覆盖范围、目标指向和模式上,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首先,什么是家庭政策?学术界一般认为家庭政策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来界定,奥尔德斯(Aldous)和迪蒙(Dumon)对广义的家庭政策进行了总结,认为由于家庭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所有政策的制定,因而家庭政策就是每种政策的一个方面。这种界定方法由于其宽泛性,因而实际操作性极差^[13]。韩蒂斯(Hantrais)和利特伯莱尔(Letablier)则从狭义角度来对家庭政策概念进行了定义,他们认为家庭政策是以家庭单位为目标并对家庭资源及家庭成员行为施加影响的政策^[14]。

其次,家庭政策有哪些类型?吕亚军认为家庭政策可分为明确型家庭政策和含蓄型家庭政策两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有无明确的政策目标及施政部门。明确型家庭政策一般明确以家庭作为政策对象制定专门计划和实施特定服务,如家庭生活教育、计划生育等,并且往往都会设立专司规划与实施的部门。含蓄型家庭政策则指的是并非特别以家庭作为政策对象,但对家庭有间接影响的政府政策,如失业救助等,且通常政府不会为此设立专职的部门,一般是将这类家庭政策纳入社会福利政策、就业政策等政策体系中^[15]。

再次,家庭政策包括哪些流派和模式?高蒂尔(Gauthier)借鉴艾斯平-安德森对社会福利制度的经典三分法(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16],将家庭政策划分为自由主义模式、南欧模式、保守主义模式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四种^[17]。自由主义模式(以英美和加拿大为代表)主张尽可能限制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中的权利,降低国家对家庭的干预程度。南欧模式(以希腊、西班牙等为代表)对家庭的支持略强于自由主义模式,但仍较低。保守主义模式(以德法为代表)将社会团结原则视为社会政策的基础,认为通过强化自然社会契约可以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只支持有特殊需要的家庭。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以北欧国家为代表)认为社会产品的再分配要通过家庭完成,主张给家庭提供最大的支持。由此,衍伸出来大致两类家庭政策:补救型和普惠型,自由主义模式、南欧模式和保守主义模式为补救型,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为普惠型。

本文认为,中国目前已有的家庭政策大致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概括。首先,在普遍性层面上,以制度安排型政策为主,如婚姻政策、生育政策、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等,例如《婚姻法》及计划生育政策,都对中国家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特殊性层面上,包括针对特殊家庭、特殊人群和专项计划三类政策。针对特殊家庭的家庭政策如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残疾人家庭、老年人家庭帮扶等一系列的社会救助与福利政策;针对特殊人群的家庭政策如女性就业支持政策、儿童保护和发展政策、五保户老人的补助等;专项计划如对家庭的临时风险救助等。

由以上内容来看,本文认为中国的家庭政策在含义、类型、模式上均有自己的特点。在概念界定上,中国的家庭政策是从广义视角进行界定,即直接或间接对家庭产生影响的政策都为家庭政策;在类型上,中国家庭政策以含蓄型为主,即并没有将家庭作为明确的政策对象,即便直接相关的计划生育政策,其政策初衷也是从控制人口出发而并非是从促进家庭发展出发;在政策流派和模式上,中国

家庭政策偏向于保守主义模式，也即补救型，对家庭的支持力度大于自由模式和南欧模式，但不及社会民主主义模式。

2. 中国家庭政策演进——“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两者平衡

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政策的演进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的萌芽期，这一时期的欧洲国家出于对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变化的担忧，实行了应对低迷生育状况的家庭政策。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战后黄金发展时期，经历二战后，全球经济、社会处于持续繁荣发展阶段，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婴儿潮”，这一时期的家庭政策表现出福利提供的普遍性和覆盖范围的广泛性，政策范围几乎覆盖了所有个人和家庭不能解决的经济问题和困难，诞生了覆盖全体家庭成员的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家庭政策。吕亚军认为这一时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政策在三个方面有突破性进展：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的创建，家庭补助金覆盖面的扩展，产假政策的优化提升^[15]。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家庭政策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关注点集中在家庭政策的负面影响上，如过于优惠的家庭政策导致个人就业和努力工作积极性的降低，对家庭责任感的削弱等，加之经济衰退的影响，财政支出的扩大，家庭政策遭遇危机和挑战，各国积极寻求家庭政策的转型，摆脱福利困境，引导和支持家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一条可能的路径。

韩央迪指出这一演进历程其背后的脉络即是“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二者的平衡”的演进^[18]。家庭主义（Familialism）原是指西方国家在福利供给过程中，家庭作为主要责任者为其成员提供福利的价值观和实践原则，强调了家庭在西方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艾斯平-安德森引入家庭主义和去家庭化（De-Familialism）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国家对家庭的不同态度^[19]。后来经过莱特纳（Leitner）的发展，得出前者指以家庭为主要照料承担者的福利供给模式，旨在通过对家庭的某种干预来强化家庭的照护功能；后者是指越过家庭，经由市场或社会服务组织来提供公共儿童照顾或相关社会服务，旨在减轻家庭户的负担^[20]。这两种模式的转折出现在二战结束后，主要基于战后各国急需国家强大的整合能力来促进发展，同时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家庭政策由原本聚焦特殊家庭的补救型政策逐步发展为面向全体公民的普惠型政策，并成立了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这一政策模式如操作过度，就会带来家庭反而被轻视的副作用。20世纪70年代至今，家庭政策在“家庭主义”和“去家庭化”之间寻求平衡，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颓势限制了国家对家庭的介入，各国开始对“去家庭化”进行反思，纠正原有的国家的过渡干预，转而在“去家庭化”和“家庭主义”的平衡中寻求政策路径，以期实现国家与家庭关系的均衡。这一时期政策目前已经体现出了对家庭的支持或投资的特征，即发展型家庭政策取向^[21]。

具体来看中国的家庭政策演进过程。中国自始以来即是高度重视家庭的国家，各项社会政策几乎都围绕家庭展开，如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征兵政策等，呈现出“家庭主义”的特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集中全力促进社会大生产，国家越过家庭，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的公社提供了多项家庭政策，如儿童保育制度，通过在工厂、机关、街道、村等设立保育机构，包括大工厂日间托儿室、中小厂托儿间、幼稚园、农忙托儿所等形式，解决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后顾之忧。例如王利娟在研究中指出，天津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保育机构由原来的28处增加到了281处，极大地改善了妇女参加生产的状况^[22]。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社瓦解，单位也不再是市民的主要归属，原有的各类集体组织趋于瓦解，各类家庭政策潦草收尾，国家在摸索新型的平衡型家庭政策路径中前行。由此，中国家庭政策的演进历程，和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演进脉络。

四、中国家庭政策构建

从以上两大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家庭政策构建的框架(见图1)。本文从价值导向、重要支柱、发展取向和具体方向这四个方面提出中国家庭政策构建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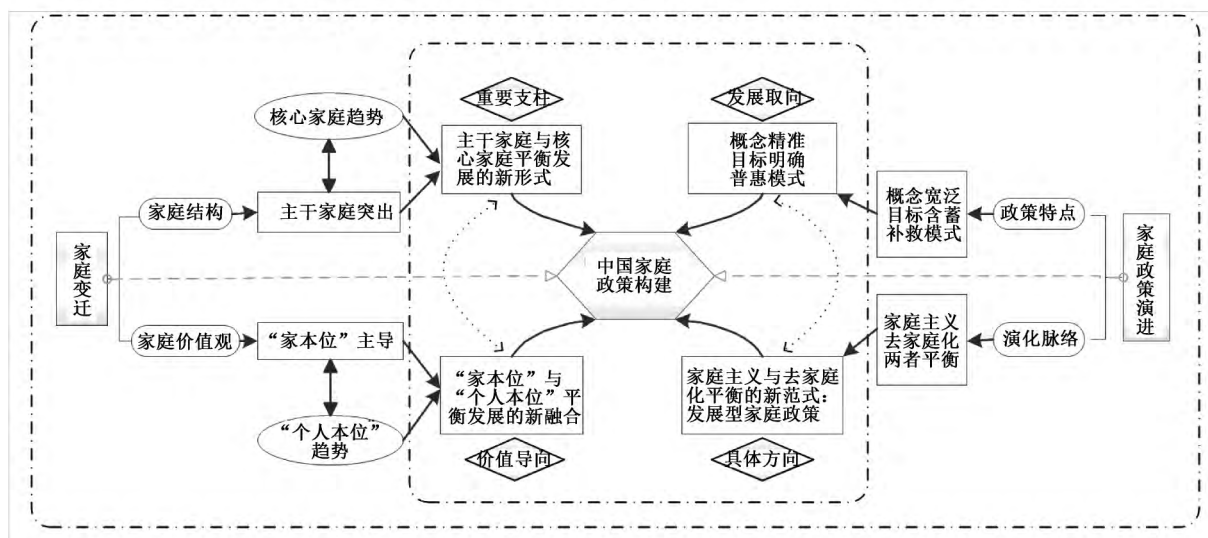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家庭政策构建框架

首先,在家庭价值导向的构建上,家庭政策要在“家本位”观念和“个人本位”观念之间取得平衡。“家本位”是中国家庭文化的固有优秀传统,虽然在近代遭到了三次重大的冲击,但其依然生机勃勃,这一价值观念是维系中国家庭团结、凝聚的核心。一个家庭的凝聚力越强,其各项功能如抚幼养老等就会越强,因而,家庭政策要以促进“家本位”观念的巩固和发展为目标。同时“个人本位”观念有其合理性,这一观念在当代强调个体性、自主空间和个人幸福。显然,“家本位”和“个人本位”各有侧重,但二者的融合及多元化的发展将是主要趋势,西方的“个体本位”与中国的“家本位”价值观念会逐步呈现各取所长、相互融合的发展状态。如西方国家家庭在代际支持上弱于中国,但并不意味着其代际之间的情感交流、互动少;中国家庭价值观以“家本位”为主,但如今这种对家庭的重视更多地被视为自我实现的一部分,包含着对家庭更加注重情感联系和对家庭中个人生活的肯定。未来,这两者的融合将体现为在“家本位”的价值观念下,同时注重个体的自主权和选择空间,二者不会互相伤害,而是和平相处并互相消弭对方的消极面,融合各自的积极面,使得家庭在注重团结和集体的同时,能够尊重个体的发展和情感,朝着平等和紧密的情感联系方向发展。

其次,“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的平衡是中国家庭政策构建的重要支柱。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从扩展型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变迁历程,中国则经历了从核心家庭到主干家庭,再到联合家庭,然后到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并存的过程,主干家庭在中国家庭变迁中贯穿始终,持续稳定发展。因而即便在当今中国,核心家庭占据主要比重,同时独生子女家庭、单人户家庭、夫妇核心家庭、残缺家庭等脆弱家庭模式比例增加,但主干家庭的作用不能忽视,主干家庭的主体是三代主干,即意味着三代同住,那么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就会大大增强,这对于中国应对老龄化困境有着重要意义。不过由于核心家庭的发展趋势强劲,主干家庭可能会以其他形式存在,如沈亦斐提出的两代家庭“一碗汤”的居住距离,就是主干家庭的变异形式^[23]。因而通过政策鼓励和促进主干家庭的稳定发展,取得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的平衡则是中国家庭政策构建的重要支柱。

再次,“政策概念范围精准”、“目标指向明确”、“系统普惠型模式”,将是中国家庭政策构建的发展取向。中国目前家庭政策呈现“广义概念”、“含蓄类型”、“补救模式”的特点,即政策概念过于宽泛,不够具体。在政策目标上不够明确,没有直接针对家庭,使得有时家庭反而成为个人获得政府福利支持的障碍。在对家庭的支持上,缺乏家庭政策的总安排,没有系统和完备的家庭政策建树,仍属于零散的状态。因而,中国的家庭政策构建要通过专属的部门,明确以家庭作为政策对象,给家庭提供最大的支持,以支持家庭的可持续发展。普惠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将不仅是事后补救,即仅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进行补救,如困难家庭补助、问题儿童救助等,而应包括对家庭未来事项的关注,如家庭凝聚力的培养,家庭应对风险能力的增强等。二是家庭政策也不仅只针对重点问题方面如婚育、教育、就业等进行漏洞补救,还应包括对家庭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常态问题的关注,如子女抚育、老人赡养等。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对目前已有的家庭政策,首先,将所有按人群划分如女性、儿童、老人等或者按困难家庭类型划分如低收入家庭、残疾人家庭等以及按照问题类型划分的如婚育政策、教育政策等,统一在家庭为单位的视角中,对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统筹,以家庭为单位,对重复政策进行合并,不足地方予以补齐,形成系统、全面的家庭政策系统。其次,对已有的以制度安排型政策为主干,各类特殊政策进行补足的政策思路进行调整,转变为以家庭发展能力为标准进行政策划分,针对家庭发展能力处于低、中、高不同阶段的家庭给予不同的政策侧重。

最后,“发展型家庭政策”将是中国家庭政策的具体发展方向。这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家庭主义”和“去家庭化”的平衡。“家庭主义”和“去家庭化”的平衡是指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支持家庭的发展,既不能过少也不能过多;过少则支持力度不够,不利于家庭的发展;过多则会消解家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不利于家庭的发展。而发展型家庭政策则强调国家不是完全替代家庭,直接插手家庭事务,也不是仅简单地对家庭存在的难题给家庭提供一些福利补助,而是通过政策、资金等的支持,体现生产性,来促进家庭能力的提升和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发展型家庭政策正在成为各国普遍的家庭政策取向。具体来看,本文认为家庭发展能力应包括:基础供给能力,包括提供衣食住行、安全等基本生存要素的能力;情感支持能力,主要包括给家庭成员提供归属感、爱、情感支持等;发展能力,包括学习能力、社交能力、风险应对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发展型家庭政策应该保障少数底层家庭的基础能力,同时也需要关注大部分家庭中层和高层家庭能力的建设与发展,真正做到以家庭整体为目标对象,旨在增强家庭发展能力、替补与完善家庭功能、提升所有家庭成员的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 [1] 摩尔根. 古代社会 [M]. 杨东莼, 张栗原, 冯汉骥译. 北京: 商务印刷馆, 1971: 654-656.
- [2]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十一卷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95-104.
- [3] 马春华, 石金群, 李银河, 王震宇, 唐灿.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 [J]. 社会学研究, 2011 (2): 182-246.
- [4] 唐灿. 家庭现代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述评 [J]. 社会学研究, 2010 (3): 152-156.
- [5] 杜正胜. 中国式家庭与社会 [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2: 14-28.
- [6] 李根蟠. 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 [J]. 中国史研究, 2006 (1): 4-24.
- [7] 王跃生. 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12): 60-77.
- [8] 周福林. 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社会影响与政策建议 [J]. 中州学刊, 2014 (9): 83-86.

- [9] 乌尔里希·贝克. 个体化 [M]. 李荣山,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7-42.
- [10] 李楯. 家庭政策与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家庭 [J]. 社会学研究,1991 (5): 88-92.
- [11] 孟宪范. 家庭: 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3): 133-145.
- [12] 徐安琪,刘汶蓉,张亮,薛亚利. 转型期的中国家庭价值观研究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202-213.
- [13] ALDOUS J, DUMON W. The politics and programs of family policy: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 [M]. Louvain, Belgium: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80: 4.
- [14] HANTRAIS L, Marie-Therese Letablier. Families and family policies in Europe [M]. London: Routledge, 2014: 61.
- [15] 吕亚军. 战后西方家庭政策研究综述 [J].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 (5): 12-16.
- [16] ESPING-ANDERSEN G.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138-139.
- [17] GAUTHIER A H. Family policie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s there convergence? [J] Population (English Edition), 2002, 57 (3): 447-474.
- [18] 韩央迪. 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 福利国家家庭政策发展脉络与政策意涵 [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6): 21-28.
- [19] ESPING-ANDERSEN G.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1.
- [20] LEITHER S. Conservative familism reconsidered: the case of Belgium [J]. Acta Politica, 2005, 40 (4): 419-439.
- [21] 张秀兰,徐月宾. 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J]. 中国社会科学,2003 (6): 84-96.
- [22] 王利娟. 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市的儿童保育事业 [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 (1): 77-87.
- [23] 沈亦斐. 个体化与家庭结构关系的重构——以上海为例 [D]. 上海: 复旦大学,2010: 63-67.

[责任编辑 方 志]